

冷戰現代性：1960年代韓國華人華文小說研究*

— 以〈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和〈煙臺風雲〉為中心

梁楠** · 翁智琦***

【目 录】

1. 緒論：韓國華人的冷戰現代性
2. 1960年代韓國華人華文小說中所體現的商品文化
3. 1960年代韓國華人華文小說中所體現的雙重性
4. 結論：韓國華人對烏托邦的想望

【摘要】

本文以冷戰現代性為視角，檢視分析1960年代韓國華人華文小說兩部作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和〈煙臺風雲〉。這兩部作品皆在呈現韓華在冷戰時期，如何在時局變化中找尋自我座標。小說從跨國移動的社會現實以及烏托邦想像辯證著因應戰爭而來的現代性為何？當現代性帶來區域移動、文化交匯、軍事技術、經濟活動的改變時，這些究竟在韓國華人身上銘刻了什麼樣的印記？因應冷戰而生的僑教政策，除了是政權以教育補助形式招攬海外華僑的手段之外，也是海外華僑得以進行跨國移動並從事新貿易型態，生產獨特商品文化的機會。另一方面，當戰爭發生，政權對峙已成事實，韓國華人在流行小說中習得想像中國的方式，並藉此創造出理想烏托邦，雖是存在於過去時空，然而卻也寄寓了對現實的無奈。

【關鍵詞】冷戰現代性；韓國華人；韓國華人華文小說；商品文化；中國想像。

* 이 논문은 동아대학교 교내연구비 지원에 의하여 연구되었습니다.

** 第一作者。東亞大學中國學系助教授 (liang-nan@hanmail.net)。

*** 通訊作者。釜山大學中語中文系客座教授 (antisweng@gmail.com)。

1. 緒論：韓國華人的冷戰現代性

現代性為一系列有關經濟、社會、文化中的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經驗的歷史精程。它指的是一連串社會和政治生活逐漸理性化的過程，伴隨著相關的技術發展，以及人口集中於城市，造就了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浮現中的新社會。換言之，現代性描述了伴隨資本主義發展的工業化和科層官僚化過程。¹⁾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在《歷史的憂慮》中深刻地討論了現代性的意義與其曖昧疆界。哈若圖寧指出，現代性有著一種雙重性(doubling)，現代性的雙重性將現代社會中兩種主要傾向的差異銘刻於日常生活之中，這兩種傾向一方面指向資本主義和其他現代力量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則涉及過去存留的痕跡，表現在持續存在的傳統價值、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當中，而也因為這樣的雙重性使得每個被重塑的現代社會得以與其他地方相似，卻又有著自己的獨特面貌。²⁾

哈若圖寧的雙重性見解進一步啟發了東亞研究學者，並藉此思考現代性與東亞之間的關係，而這也是諸多文學作品中恆常出現的辯證性主題。基本上，現代性課題在東亞社會有著兩個重要面向：第一，遭遇「現代」並非僅是思索如何因應「新」與「他者」的出現，更重要的是建構「自我」；第二，在東亞社會浮現的「現代性」並非「單一的」或「西方的」，而是多重且相互扣連的一組社會現象。而這兩個面向是基於東亞現代性中的歷史條件：自19世紀中期以後建立的國際社會及其中的「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這個源自國際社會的跨國性即是「殖民現代性」的標誌，因其建構了「西方與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這組二元對立關係。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8年大韓民國政府成立，1950年韓國爆發了20世紀韓國歷史上最慘烈的一場戰爭。韓戰不僅最終導致韓半島的南北分裂，韓戰在韓國與美國的關係上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於戰爭，韓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任何方面都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性。在戰爭的廢墟上，韓國經濟只能依靠美國的援助。³⁾從此時期韓國社會的發展情況來看，仍然沒有繞開哈若圖寧所指出的現代性的雙重性軌道。雖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制度層面大部分來自美國，但根深蒂固的殖民地時代的影響持續存在在韓國的生活樣態當中。僅就經濟層面來說，韓國經濟的基本原理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市場原理，但在現實中，卻是官僚與資本家相勾結，形成了韓國社會特有的官僚資本主義。這種經濟形態至朴正熙時代被繼承了下來，再經過第五、六共和國也沒有發生改變，而是

1) 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巨流圖書，2003，pp. 253-254。

2) Harry Harootunian,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1.

3) 임영태, 《대한민국 50년사》, 들녘출판사, 1998, p. 172.

擴大再生產。⁴⁾ 此時期的韓國雖然制度是美國的，但運用它的人們的思考方式和精神仍然是殖民地時代的。換句話說，韓國社會相當於「硬件是美國，軟件是日本」。韓國社會就這樣在冷戰現代性的雙重性影響下，逐漸喪失了自身的認同感，在社會文化上混雜著美國的、日本的、韓國的等多種因素，形成了一種混合型韓國社會。⁵⁾

然而，「現代性」的追求與矛盾並非僅在於以國家為單位或整體的實踐，更是體現於各種新興主體的歷史經驗。⁶⁾ 也就是說，基於每個社會遭遇「新」的途徑都不一樣，「新」的到來也不一定會全然抹去過去事物，所以不同社會通過現代性的路徑並不相同。比如，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一時間日本的經濟力量在韓國也呈現弱化現象。尤其在工業領域，由於日本人經營的工廠被封閉，日本工程師也相繼回國，美軍政當局雖然採取了擴大生產政策，但當時韓國的工業產量還是在急速下降。與韓國經濟相比，生活在韓國的韓國華人(韓華)⁷⁾ 經濟卻相對穩定，在貿易方面韓華的活動更為活躍。⁸⁾ 究其原因，在殖民地統治體制下建立的東亞貿易網絡和人口移動空間具有連續性，相反，以冷戰為基礎的國家具有以前社會、政治、經濟、時空間斷裂或重組的性質。韓華在韓國的移居生活已經經歷了一個多世紀，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韓華與韓國人共同經驗著韓國的殖民地時期、國家獨立時期、以及跨國時期的一系列歷史變化。從1940年代後期的東亞局勢來看，韓國、台灣、中國大陸各自成立政府後，隨著國家支配體制的鞏固，以前的東亞韓華空間不再運轉，這給韓華的社會、經濟以及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影響。⁹⁾

延續著上述討論，本文所指稱的冷戰現代性，便是要檢視韓國華人在經歷二戰、韓戰後，面對韓國國內經濟蕭條景況，以及因戰爭帶來的離散與認同困境，如何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二戰後所開啟的冷戰，基本上成了一段文化熱戰時期。在這時期，書寫與政治運動的結合更加緊密，誠如王德威所指出：這個時期的文學是「既向作家求索墨水，也向作家求索血水的時候。」¹⁰⁾ 然而，各地的華文環境與發展條件受限於各自獨立卻又彼此相關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使得文學生產狀況因而有了不同的樣貌。據筆者調查，目前可以收集到的韓國華人華文小說作品，最早出現在1960年代。這一時期也可以說是韓國華人進行華文創作的第一個頂峰時期。僅從這一層面就可以體現出，冷戰時期所形成的文化熱戰同樣

4) 參考임영태, 《대한민국 50년사》, 들녘출판사, 1998, p. 194.

5) 임영태, 《대한민국 50년사》, 들녘출판사, 1998, p. 118, p. 173.

6) 陳佩甄, 〈現代「性」與帝國「愛」: 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 《臺灣文學學報》, 第23輯, 2013. 12, p. 104.

7) 韓國華人(韓華)指長期生活在韓國地區的漢族以及被漢族同化或在文化上具有一體性的群體。有關韓華的更詳細論述請參考梁楠, 《韓國華人華文文學論》, 秀威出版社, 2020. 07, pp. 9-16.

8) 參考馬仲可, 《山東華僑研究》, 新星出版社, 2005, p. 68.

9) 박규택, 〈중층적·역동적 시공간을 통한 한국화교 이해〉, 《한국민족문화》, 제63집, 2017. 05, p. 262, p. 270.

10) 王德威, 〈傷痕書寫, 國家文學〉, 《一九四九: 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 三聯書店, 2008, p. 8.

影響到了韓華的文學創作上。筆者們要探討的1960年代的韓國華人華文小說有兩部，第一部是張嵐的〈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於1964年6月至1964年12月間，分6期連載於韓華雜誌《韓華春秋》上。第二部是長峰的〈煙臺風雲〉，於1965年8月至1965年12月間，分5期連載於《韓華春秋》。有關冷戰語境下的韓華華文小說研究，在學界尚屬空白。筆者們試圖通過本文對此領域進行開拓性研究，通過這兩部小說作品，為以下疑問尋找答案：伴隨著冷戰而來的現代性，究竟在韓華身上銘刻了什麼樣的印記？是否呈現哈洛圖寧所說的「雙重性」？若有的話，這些雙重性在文學作品中如何展現？這便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2. 1960年代韓國華人華文小說中所體現的商品文化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部小說使用自傳體形式，作者以自己的實際經驗為藍本，寫作小說，「只求讀的人在此可以找到自己的內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現實問題，以及自己的將來。」¹¹⁾小說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一位韓華青年於1960年代左右至台灣求學的經歷。小說採用倒敘的方式，開篇講述一位窮困潦倒的韓華青年鍾辰為謀求生路，只身從釜山來到首爾。正當他彷徨無措時，幸好遇到初中同學黃秀民和宋強。通過交談鍾辰得知原來身在首爾的韓華青年也一樣求職艱難。無宿可投的鍾辰只好暫時住在宋強家，靠一份家教維持生計。一天一輛時髦的轎車從他身邊飛馳而過，從車上走下來的女人迫使他回想起所有的往事。這個女人也是他的初中同學名叫趙萍萍，他們的再次相見是鍾辰高二那年暑假在台灣的基隆碼頭。當時許多留學台灣的僑生都借著海關檢查松懈之機，往來台韓之間大批的做買賣，趙萍萍也是其中一位。趙萍萍曾向鍾辰表白心意，鍾辰卻因兩人家庭背景相差懸殊而有意躲避。感情上的失落加上聯考名落孫山，使鍾辰變得鬱鬱寡歡。走投無路的鍾辰無奈打算向人借錢跑一趟單幫。正當他滿懷希望地踏上基隆碼頭時，卻再次遇到了趙萍萍。心裏又在複雜沖動的鍾辰為給趙萍萍解圍挺身而出，卻因為趙萍萍的違禁品被扣留在海關。最後他再沒能取回自己的行李，只得知趙萍萍已經跟她的表哥訂婚，她是不再回台灣，而自己是再也不能回台灣，他的一切損失一光。¹²⁾

這部小說值得關注的地方就在於它真實再現了1960年代韓華青年的生活斷面、具有現代性內涵的事物，同時也揭露了冷戰現代性語境下所產生的一種建立在跨國交通基礎上的一種特殊的商品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仍然留在韓國的華人在法律上被規定為中華民國公民。台灣當局從1949年開始加強對韓華社團管理以及韓華教育，通過韓華教育誘導韓華具有偏向台

11) 張嵐，〈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韓華春秋》，第1期，1964.06，p. 28。

12) 更詳細論述請參考梁楠，《韓國華人華文文學論》，秀威出版社，2020.07，pp. 93-98。

灣的政治認同。¹³⁾因此，對於韓國政府來說，韓華在政治上以及意識形態上並不能構成威脅性，但是韓華經濟始終是韓國政府擔心的問題。為了牽制韓華經濟發展，韓國政府采取了一些不利於韓華的貿易政策，比如1948年2月，朝鮮銀行發表「外匯預存制度」，對外的民間貿易由物物交換，轉變為外匯中心，並在1949年1月25日，實施「進出口分配制度」。1949年6月13日，韓國又發布《對外貿易與其他交易之外匯辦理規則》，規定進口所用的外匯，僅能利用出口所獲得的外匯，禁止使用其他來源的外匯。當實施《進口分配制度》後，想要進口物品，必須先獲得美金，但出口業績較低的韓華業者，經常無法從韓國政府手中獲得充分的美金，因此必須在黑市出2至3倍的匯價購買美金，以利進行貿易。由於韓華逐漸無法承擔這種壓力，導致貿易業績一年不如一年。¹⁴⁾在這樣的背景下，就衍生出一種特殊的韓華商品文化——「僑生貿易」。

所謂「僑生貿易」是指在台灣所實施的對僑生優惠政策下，眾多韓華青年都選擇赴台留學，特別是那些家境貧寒的韓華。但是由於韓國政府的外匯政策，他們又沒有可以維持留學生活的外匯資金。因此，開始了往返台韓的「僑生單幫貿易」。中華民國政府為強化對華僑的向心力，積極推展對海外華人政策與支援；而韓華為鞏固韓華社會的穩定發展，亦積極吸收政府的海外華人政策與支援。¹⁵⁾「僑生貿易」，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的商品文化。

小說〈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主要有兩條敘事線索：第一是以首爾為背景，講述三位韓華青年在首爾求職的艱難歷程；第二是以台灣為背景，回憶主人公鍾辰在台灣求學經歷。「僑生貿易」自始至終都貫穿在第二條線索之中，甚至是主人公鍾辰美好愛情的開始，也是這段愛情悲劇的終結。

鍾辰高二那年暑假，收到家信說有同學給他帶了一筆錢，於是來到基隆碼頭等他的同學。

我站在基隆的碼頭，曬著焦熱的太陽，等待著同學們的行李被檢查，實際所謂檢查的手續只不過是形式而已，因此在這種漏洞中，有很多同學大批的做買賣，這些人撈取打量的錢，他們的境遇多半都是值得同情的。

我看到他們一箱，一箱，一包，一包的搬著東西，自己既羨慕又熱衷人家的收獲。¹⁶⁾

鍾辰起初並不看好這種「僑生貿易」，他仍然堅信只有知識才能改變韓華的命運。但

13) 馬仲可，《山東華僑研究》，新星出版社，2005，p. 75。

14) 王恩美，〈《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3卷第2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1.06，pp. 223-224。

15) 王恩美，〈《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3卷第2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1.06，p. 233。

16) 張嵐，〈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韓華春秋》，第5期，1964.10，p. 30。

是他也明白這種現象是時代背景所至，因此認為他們也值得同情。一開始，韓華青年們只想攜帶一些受台灣人歡迎的韓國商品到台灣變賣，換取學費。時間久了，更多赴台留學的韓華青年，則把這種方法當成「輕鬆的發財之道」，因為他們覺得這比起自己的父母辛辛苦苦在韓國賣烏冬炸醬面賺錢要容易得多。因而「台灣的香蕉、鳳梨、茶葉..... 韓國的美國軍裝、鮑魚、海螺罐頭、魷魚.....」就成了僑生貿易中的主要商品，一時間興起了一種特殊的商品文化。

那天，在碼頭上鍾辰也遇到了同樣在做「僑生貿易」的韓華趙萍萍，於是愛情的萌芽開始蠕動。但是經濟差距的懸殊，使他始終沒有勇氣將這段愛情認真的發展下去。覺得自己「理想的柏拉圖式的愛情，已經是被時代所遺棄。」¹⁷⁾ 當他感情受挫、聯考落榜、身無分文，走投無路的時候；當他已經墜入罪惡深淵，想要自拔的時候，得出的最終結論居然是：「我不是也可以像人家做一趟買賣嗎？」¹⁸⁾ 不幸的是，這一趟買賣最終卻毀掉了他的一切。

1960年代，韓華也紛紛發表文章議論此現象，一位筆名為禹湯的韓華就以〈都是魷魚惹的禍〉為題，評論道：「自從韓國僑生在中韓無法外匯之情況下攜帶魷魚以換取在台所需之生活費以來..... 最不能使人原諒的是與異邦海關之間的沖突，其對中國人的惡劣印象可見一斑了..... 我們三萬多華僑傳統的美德好評，也無辜的烙染上斑斑汗點。」¹⁹⁾ 可見，當時的韓華既能理解韓國僑生的無奈，但同時又對這種現象愈演愈烈的情形表示痛心。

〈煙臺風雲〉這部小說時間設定在清末民初，主角崔如宏的父母因故喪生，他逐漸踏上復仇之路，最後成為革命軍。崔如宏在復仇後，帶著心愛的青樓女子紅雲一起離開煙臺。小說從在外跑船的崔如宏回到煙臺，來到熟悉卻充滿回憶的當舖前，開始逐步交代主角崎嶇的身世，進而推動故事。位處於朝陽街的當舖，是母親帶著幼時的崔如宏含淚當掉手鐲的所在，也是五年前認識紅雲的地方。當時，崔如宏遇上父親在出海捕魚時遭日本軍艦抓走的意外，母親也因此憂憤交錯、精神錯亂，在經歷十多年生活煎熬後，與紅雲的相遇為崔如宏帶來新的幸福生活。然而，兩人的命運是多舛的，除了崔如宏投入的革命事業外，在煙臺橫行霸道的程瞎子、胡大彪、李三等惡人角色，都為這兩人的生活製造許多挫折與衝突。比如程瞎子之所以是「瞎子」，乃肇因於五年前崔如宏為了解救差點被程瞎子性侵的紅雲，以及回應程瞎子的扁鏢攻擊，情急之下使出流星腿，踢中扁鏢，扁鏢直接刺瞎了程瞎子的左眼。胡大彪雖是地方角頭，然而他的身手完全不敵程瞎子與李三的武功，因此也只能表面上不時和青樓收些保護費，卻完全無法保護青樓的安危。李三也許是煙臺

17) 張嵐，〈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韓華春秋》，第5期，1964.10，p. 29。

18) 張嵐，〈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韓華春秋》，第5期，1964.10，p. 31。

19) 禹湯，〈都是魷魚惹的禍〉，《韓華春秋》，第8期，1965.01，p. 15。

一帶武功最強的惡人，但也因此，他總四處賒帳，吃霸王餐。崔如宏後來與天地會成員一同在廣州舉事，並逐步北上在煙臺掀起反對滿清的革命。在革命過程中，小說也透過程瞎子與胡大彪的一場對峙，揭露崔如宏與兩位惡人：李三、程瞎子的冤仇糾葛。崔如宏的父親崔振乾曾於李三是結拜兄弟，後來兩人因故打起，崔振乾也在打鬥中傷了李三的一隻胳膊，兩人因此結下冤仇。而崔如宏與程瞎子的恩怨，並非僅止於五年前的傷眼事件。許多年前，程瞎子喜歡崔如宏的母親，然而當時崔如宏的母親卻與崔振乾結婚，引發程瞎子不滿。於是程瞎子趁著崔振乾被日本軍艦抓走之際，性侵了崔如宏的母親，導致她不甘受辱，因而投海自盡。

小說的衝突主要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小說文本內那些影響、接續故事的矛盾事件，二是小說文本內帶有現代性意涵的物質，三是小說的外緣條件，也就是〈煙臺風雲〉作為一部生產於1960年代卻描寫清末民初時期，且帶有新派武俠、言情風格的小說存在意義。

中國最早出現的長篇武俠小說為清代古典名著《三俠五義》，舊派武俠一般以1923年湖南人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為起點，舊派武俠的最著名作品是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舊派武俠小說以章回體為主，注重傳統倫理觀念與歷史結構，重複談論江湖典故、幫派恩，也可以說是在內容上表現江湖俠義精神和中華武術特色。²⁰⁾新派武俠小說則主要是在戰後出現，興起於香港，已至風靡港、臺與其他華人地區。新派武俠小說基本上在傳統武俠小說的基礎上加上現代（甚至西方）的元素，不受傳統觀念的限制，用較現代的文字及角度去闡釋歷史。因此，在新派武俠小說中，除了報恩復仇、除暴安良、剿匪平盜之外，還會有尋寶探險。此外，新派武俠小說在情感描寫上，突破過去俠情的格局，在愛情中表現人性崇高和複雜性。有時更有奇特的愛情場面，多角的感情糾葛等。就武功描寫上，舊派武俠小說主要寫外功、輕功，如飛簷走壁和兵器、拳腳較量等。新派武俠小說更注重寫內功、氣功、行毒、暗器、點穴以及布陣、心術的較量，甚至會有新式武器，表現出現代科技文化知識以及崇尚現代文明觀的想像。²¹⁾

清末民初正是西方現代性大量入侵、衝擊的時代，在小說中，長峰也運用了從西方傳入的物質打造傳統與現代的交鋒。比如崔如宏趁著去海參威特別買了「洋玩意兒」送紅雲，並對她說：「這是手錶，是西洋貨，在咱們清國是買不到的。」²²⁾在這裡，手錶作為一種西洋貨、洋玩意兒，它代表著西方的新穎價值，是清國沒有的。也因為清國沒有，因而顯得珍貴，並備受推崇。

更精彩的展現則是在小說角色所使用的武器上。程瞎子使用了扁鎚，李三使用蠻力鐵胳膊、鐵柱子、七節鞭，姚富貴使用鋼叉以及來福手槍。假如程瞎子與李三所使用的武器

20) 羅立群，《中國武俠小說史》，瀋陽遼寧人民，1990，p. 21。

21) 羅立群，《中國武俠小說史》，瀋陽遼寧人民，1990，pp. 23-24。

22) 長峰，〈煙臺風雲〉，《韓華春秋》，第15期，1965.08，p. 29。

代表著舊時代勢力，姚富貴同時運用鋼叉與來福手槍，並成功壓制李三，便象徵著新舊時代的承接，且必須依賴代表西方現代性的「洋傢夥」取得最關鍵性的勝利。當舊勢力遇上新技術，也只能屈服，就如同李三所說：「姓姚的，我李三雖然今天落在你的手裡，心裡到底有點不服氣，你使用的是洋傢夥。」²³⁾那麼，崔如宏與徐光德使用了什麼樣的武器呢？小說中並未多加說明，但他們所參與的同盟會革命黨活動，卻暗示了一切。

眾所周知，清末民初是中國面臨立國之本、強國之路的危機時刻，當時中國的傳統文化無力回應西方現代性的挑戰，因此知識份子普遍認知到必須現代化，²⁴⁾學習西方先進文明才能改造中國的頹弱社會。因此，同盟會革命黨代表的正是向西方借鏡的文化組織，他們象徵危機時代的正當革命，而崔如宏與徐光德的人格特質與行為舉止則是這項價值的最佳展現。他們為了推翻滿清，深思熟慮、佈局縝密，最後甚至維持紛亂時代的穩定秩序。即便他們在起義時肯定使用了武器，但屬於他們更強大的武器，是要將舊中國改造成現代的思維。

事實上，〈煙臺風雲〉不同於〈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時代背景是在冷戰時期，〈煙臺風雲〉的故事發生於清末民初，是封建與現代劇烈衝撞的歷史交界處。然而，〈煙臺風雲〉無論在形式或主題上，無疑也是冷戰現代性的產品。誠如前述，〈煙臺風雲〉作為一部發表於1965年的作品，故事時間卻安排在清末民初時期，並表現了武俠的精神，這樣的設計究竟有著什麼樣的時代意義呢？就形式上，〈煙臺風雲〉採用武俠與言情的風格推進故事，這樣的風格展現其實與冷戰時期以香港為中心輻散開來的流行文學，尤其武俠小說，具有極大關係。

武俠小說雖在20世紀初就已在上海出現、流行，然而真正對華人文學與閱讀社群造成重大影響的，則是冷戰之後，以香港為中心生產的武俠小說。冷戰時期的華人華文文學，以通俗文學最受讀者歡迎。尤其在香港社會，最受普羅大眾歡迎的往往是為商業而文學的通俗小說，如此情形也造就在當時諸多文人皆寓文維生。而這類通俗作品主要見於各大報紙副刊、雜誌書刊，以及專門發行此類流行小說的出版社（如環球文庫）。這些流行小說能夠在此時期崛起，甚至打造出文化工業般的生產模式，除了是因應現代化變遷而生產出的娛樂活動之外，冷戰局勢也造就了武俠、歷史以及奇情小說的流行。²⁵⁾武俠小說是一種大眾文學。這個通俗的本質使到武俠小說的「文化商品性」特強。²⁶⁾當時，梁羽生與金庸的作品便是透過報紙副刊、雜誌甚至電影作品，在香港、臺灣以及其他海外華人

23) 長峰，〈煙臺風雲〉，《韓華春秋》，第15期，1965.08，p. 27。

24) 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份子》，上海三聯書店，1999，p. 22。

25) 翁智琦，〈冷戰時期臺港文學在泰華的傳播與影響：以《世界日報》為線索〉，2017年台灣文學學會第一屆年會會議論文，p. 4。

26) 鄭樹森，〈大眾文學·敘事·文類——武俠小說札記三則〉，《二十一世紀》1991年4月號總第4期，p. 113。

社群中進行廣泛的生產和流通。²⁷⁾武俠小說作為民國初期出現，又受戰後資本主義刺激而崛起的文化商品，即使是短暫的逃避現實的娛樂，但其廣受歡迎，長期風行的特質，其實也隱約反映出華人群體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認同。

3. 1960年代韓國華人華文小說中所體現的雙重性

〈煙臺風雲〉具有武俠與言情特質，小說分為兩條主要故事線，一為崔如宏如何復仇及參與革命軍之過程；一為崔如宏與紅雲的戀愛如何在各種困難與時代革命之間展現其強韌。

〈煙臺風雲〉開頭首先揭露故事場景是「古老的港口」，在這古老港口，曾有傳說已久的「海市蜃樓」傳奇美景。一次出現在道光年間，一次則是故事中的現在時間：清末民初。長峰以「古老」說明煙臺的悠遠歷史，而「港口」則是地方產業特質，並且用「古老港口與海市蜃樓」²⁸⁾這樣的地方傳說作為故事開端，傳遞煙臺這個地方的日常景象與生活經驗。

假若傳奇美景是太平盛世的象徵，那麼道光年間以及清末民初，對於煙臺人民而言，是生活充滿希望與可能的繁華時光。相較之下，小說擅於使用「暗示」指出榮景不再或者時代即將發生巨變。比如小說中以「有人說自從甲午那年鬧日本鬼子後再也不會看到『海市』了」，指出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不只侵略了清國土地，也破壞了太平盛世的光景，隱隱顯現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又以「這次再顯，大概是咱們皇上有德，象徵做國泰民安，可是也有人認為『國泰民安』是一種『迴光返照』，也許不久這裡會來臨一次很大的暴風雨。」為故事發展與之後的種種衝突製造了懸疑，也藉此呈現了現代性的雙重性。這也指出武俠小說作為一種冷戰新興的文化商品的特殊意義。雖然，武俠小說所代表的大眾文化就市場訴求而言，時常有著消費的、缺乏強烈省思批判、藝術自覺不高的特質，但這種文化商品有時也深藏某些理想成分，暗含某種烏托邦的元素，透過作品的熱鬧情節，在消閒上吸引讀者，但同時也映照出讀者內心理無意識的渴求，間接滿足群眾混藏的、期望美好的慾求。²⁹⁾

作為一部連載小說，〈煙臺風雲〉基本上依循著正邪不兩立以及男性中心的價值觀，不時在故事中創造各種衝突、矛盾，藉以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也進而推動故事發展。因

27) John Christopher Hamm,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p. 1-2, pp. 49-78.

28) 長峰，〈煙臺風雲〉，《韓華春秋》，第15期，1965.08，p. 29。

29) 鄭樹森，〈大眾文學·敘事·文類——武俠小說札記三則〉，《21世紀》，1991年4月號總第4期，p. 114。

此，〈煙臺風雲〉從一開始就以具正義感的青年崔如宏不以「窯姐」身份看待於他有恩的紅雲，藉此告訴讀者，這是一段不因職業去區分貴賤的健康之愛。然而紅雲的存在僅是用於讓其他男性角色競奪，使之得以發揮故事設定的功能。因此，可以想見，小說中崔如宏與紅雲之間的愛情，屢屢遭到其他挑戰，如程瞎子多年前欲侵犯紅雲，遭崔如宏阻擋並遭刺瞎左眼，之後便一直要向崔如宏復仇。而鐵胳膊李三是縱橫煙臺二十年的地方土匪，也是崔如宏的父親崔振乾早年的結拜兄弟，後因故起了爭執遭崔振乾打傷一隻胳膊，從此懷恨在心，並順勢將仇恨轉移至崔如宏身上。最終，程瞎子與鐵胳膊李三都因「作惡多端」而遭罰，不得善終。

這些衝突在小說中，透過許多文化上、物質上的特徵呈現出現代性的雙重性以及新舊交鋒。首先，代表正義一方的崔如宏、同盟會煙臺負責人徐光德、地方望人姚富貴，他們的命名無論是「如宏」、「光德」或者「富貴」，就字面釋義上都具有正向、被社會肯定的文化意涵，反之，程瞎子與李三的名字則顯得苟且、不講究。因此，唯有像是崔如宏、徐光德、姚富貴這類站在正義一方的角色，得以在即將展開的新時代中存活下來，而程瞎子與李三這類惡人，他們只能跟著舊時代一起被埋沒在時光碎片中。然而更具體的現代性雙重性展現，則是在物質層面，而這也能更說明正義一方如何能代表「現代」，而邪惡一方又是怎樣的「舊」。正義得到伸張，基本上是剛健精神想像的實踐，當俠義精神結合新時代、新式武器獲得正面的證明，似乎也將「俠」這個舊符號賦予了新精神，除了滿足韓華讀者對「失落的中國」的期待之外，也在冷戰時代產生安撫與精神愉悅的功能。³⁰⁾

與〈煙臺風雲〉相比，〈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沒有通過為故事發展的種種衝突製造懸疑來暗示現代性的雙重性，而是通過真實再現1960年代韓國社會以及韓華社會的時代面貌，直接呈現現代性的雙重性。這種雙重性主要產生於韓華人口移動的連續性與以冷戰為基礎的國家體制的非連續性間的悖論關係。也就是說，韓華移居韓國的歷史已經連續了一個多世紀，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也形成了韓華自己的東亞地區貿易網絡。但是當1940年代末期韓國、中國大陸以及台灣各自建立政權後，它們各自具有與以前社會、政治、經濟、時空間斷裂或重組的性質³¹⁾。因此，韓華的韓國移居雖然仍然保持著連續性，但是韓華的經濟與認同等不免受到影響，隨之發生斷裂或者重組。

首先，體現為經濟上的兩級分化。小說開篇是主人公鍾辰，為了尋找出路，毫無目的地奔往首爾，到達之後卻發現對未來依然非常迷惘。像鍾辰這樣的韓華青年，應該不在少數，這也許與當時的韓國社會風氣不無相關。朴正熙政權時期的國政指標之一就是經濟開發和國家現代化。經濟發展被放在首要地位，為此建立了全力促進經濟發展的體制。隨著

30) 高家謙，〈武俠：近代中國的精神史側面〉，《中極學刊》，1，2001，p，191。

31) 박규택，〈중층적·역동적 시공간을 통한 한국화교 이해〉，《한국민족문화》，제63집，2017.05，p. 270。

這樣的產業化政策，至1960年代，棄農現象日益嚴重。大量人群盲目離開農村，聚集首爾³²⁾，這種現象也在無形中影響著韓華青年。鍾辰對首爾的記憶還是孩童時的星星點點，眼前首爾的變化令他眼花繚亂。「人潮、高樓、汽車、廣告牌相互的交映、錯雜、吵鬧」。這一切使他感到「冥冥中聽到了一個時代的巨輪在輾轉的轉動」³³⁾，這裏的轉動似乎就意味著韓國的現代化進程。

與韓國的現代化背道而馳的是韓華社會的沒落。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韓華經濟受到日本當局的諸多限制，發展艱難。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韓華經濟雖然因為日本的退場而迎來了一時的興盛，但是這段黃金時期卻非常短暫。因為這是由特殊時代環境而產生的畸形發展，因此伴隨韓國社會的穩定很快就消失了。³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中國大陸貿易被韓國政府封鎖，這使得韓華經濟受到重挫，再加上韓戰的迫害，韓華經濟開始一蹶不振。

當時的韓國經濟發展政策實施的結果也造成了兩個極端現象：工業的高度發展和農業的低度增長，其結果拉大了城鄉間的收入差距。由於韓華的東亞貿易網易受到破壞，再加上韓國政府對韓華貿易的諸多限制，韓國經濟與韓華經濟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嚴重。因此，展現在小說主人公鍾辰眼前的首爾風景是：人潮、高樓、汽車、廣告牌的五彩繽紛中，夾雜著「那麼多的乞丐和惡棍」³⁵⁾；坐落在繁華的首爾城中的那所毫不應景的，殘破不堪的韓華學校；在燈火輝煌、霓虹閃耀的首爾市內居住的韓華青年宋強的家裏，卻依然點著昏暗的油燈。

其次，體現為認同的雙重思索。在現有研究中，由於中國文化圈經驗通過與其他文化圈的接觸而產生的矛盾混雜狀態，華人群體對身份的不確定，對認同的尋找與思索是經常被觀察到的特征。³⁶⁾這部小說同樣體現出這種華人群體的共性，但同時也體現著韓華群體的獨特特征。韓華青年宋強祖孫三代擠在一個簡陋的房子裏度日。他那位「跛著兩只纏足小腳」³⁷⁾的婆婆，可謂韓華移居歷史的見證；韓華的「三世同堂」，也證明著韓華人口移動的連續性。一百多年來與韓國人共同經歷生死命運的韓華，本應屬於這個社會。但自1960年代，韓國政府開始通過身份證號碼，建立全民管理體制，韓國社會生活上的所有法律行為，都以身份證為基礎進行。未能編入該名單的人，不能被認定為韓國社會的法律居民。由此，居民登記制度在韓國社會成為了區分「我們」和「他者」的制度和心理障

32) 임영태, 《대한민국 50년사》, 들녘출판사, 1998, pp. 316-397.

33) 張嵐,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韓華春秋》, 第1期, 1964. 06, p. 28.

34) 參考馬仲可, 《山東華僑研究》, 新星出版社, 2005, p. 71.

35) 張嵐,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韓華春秋》, 第1期, 1964. 06, p. 28.

36) 고희림, 양난, 〈문화접촉의 경험이 문학작품을 통해 구현하는 작중인물의 심리학적 접근과 고찰〉, 《중국학》, 제63집, 2018. 06, p. 49.

37) 張嵐,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韓華春秋》, 第3期, 1964. 08, p. 29.

礙。³⁸⁾韓華成爲了韓國社會中的「他者」，與自己的意志毫無相關的陷入受牽制的處境。

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屬於中華民國公民的韓華，實際上也並非名副其實。中華民國政府對韓華的「關愛」，其實在意的是「政治效果」³⁹⁾。換句話說，韓華生活在韓國，國籍是台灣，但實際上他們卻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歸屬。就像〈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中的主人公鍾辰，雖然自己實實在在地生活在韓國社會裏，但卻感覺「一切的實體只是一個大鏡子裏的虛影」⁴⁰⁾。冷戰現代性，促使1960年代的韓華開始思索自身的認同。

4. 結論：韓國華人的烏托邦想望

本文從哈若圖寧的現代性之雙重性切入探討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在冷戰時期的兩部重要小說〈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和〈煙臺風雲〉，它們展現了何種冷戰現代性的面貌。

首先，〈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透過冷戰後韓國的政治環境與政策施行以及臺灣的僑教與僑生單幫貿易，呈現了韓國華人在冷戰情境中的面對認同與歸屬的多重糾葛。〈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中的一些「小事件」，如小本買賣過程、經濟困頓與情緒低落的時刻，這些雖都是日常性的表現，卻也揭示了這些日常與當前時刻並不完全融合。這些日常在冷戰後韓國華人的特殊境遇中，都指出一種特殊不均衡 (unevenness)、不平等的情況。然而，卻還是有著一群默默無聞之人，每天生活在這樣的不均等之下，受制於韓國國家歷史企圖抹除各種時間性雜沓並存的狀況。⁴¹⁾〈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正是凸顯了這樣的窘境。

〈煙臺風雲〉則是透過從歷史中提煉出一段時光 (清末民初)，並將之嵌入冷戰後的韓國華人記憶，讓歷史與記憶在當前時刻出現衝突與扞格。當韓國華人每日經驗著新的戰後生活時，卻也必須透過召喚歷史去突破被限制的國界或時間界線。歷史與記憶、經驗在〈煙臺風雲〉中得以共享著當前時刻這個空間，只是歷史在此回手探看往事，而記憶、經驗則堅持過去仍未消逝。此外，〈煙臺風雲〉除了讓過去與現代的時間拼湊、並置之外，武俠小說的形式則指向更大的政治意圖。

38) 정인섭, 〈화교에 대한 차별: 그들은 한국사회의 주민인가?〉, 《사회적 차별과 범의지배》, 博英社, 2004. 12, pp. 188-189.

39) 參考王恩美,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3卷第2期,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1. 06, pp. 229-231.

40) 張嵐,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韓華春秋》, 第4期, 1964. 09, p. 29.

41) 哈若圖寧著, 陳春燕譯, 〈「我們的現代性」/我們的歷史〉, 《歷史的記憶與日常: 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 陽明交通大學, 2017, p. 14.

事實上，「武俠」是生成於近代中國的消費話語，試圖為華文讀者建構歷史與文化的語境。「武俠」中的武是形式，俠是理想的文化精神，透過這樣的文化符碼建構過程，帶出實踐理想的知識準備，並進而連結到召喚國魂與強國保種的潛在目標。因此，在諸事訴諸於「武」的故事中，身體與國族想像都在通往烏托邦的路上。武俠小說可以在思想史的意義上勾勒一個近代中國的形貌，卻也在精神史的脈絡下顯現為一種「症狀」。尤其當俠的衝動作為革命的精神指標，其實並非平面的單位結構。在俠的基礎點上，當激進、暴力、流血的革命手段訴諸於「身體政治」以推翻一個極權政府或形構一個理想的烏托邦社會，身體的背面往往隱含了一個龐大的國族想像。⁴²⁾如同在〈煙臺風雲〉中，社會秩序或者所謂的公道正義最後是由民間發起的同盟會革命軍進行安排與確認。於是，「治安大隊」取代了「衙門」的功能，代表「現代」的身體於焉誕生。

那麼，反映在〈煙臺風雲〉中的烏托邦是什麼呢？韓華作者大多來自中國山東，因此，〈煙臺風雲〉以山東煙臺為故事發生場景，無疑是作者將因戰爭造就的離散與鄉愁寄託於故鄉。而〈煙臺風雲〉所象徵的現代中國之誕生，或許是長峰身在韓國的離鄉症狀與中國想像。那段理想中國，顯然已因為戰爭而有了巨大變化。因此，有別於其他韓華小說作者將故事時間設定在冷戰之後，長峰透過描寫過往時光，虛構過去，並保留了現實世界中美好的一面，剔除了足以造成生活負面影響的另一面，以簡化、弱化、理想化的方式⁴³⁾，寄寓韓華的想望。

然而，現實中的韓華又在如何找尋自己的烏托邦呢？韓戰後，為了恢復國力，韓國不能不依靠美國的援助。在此過程中，美國文化也自然流入韓國，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由危機所驅動的結構，它讓商業文化開始起步。哈若圖寧認為，不均衡，並非發展過程中一個終會被克服的階段，而是個資本主義必須不斷製造、再製造的關鍵條件。⁴⁴⁾隨著美國文化的不斷湧現，美國式的思考方式也開始占據絕對地位，甚至造就資本主義的迷魅現象，而韓國的固有文化卻因此逐漸變得模糊。咖啡和流行歌曲、巧克力和黃油，還有舞蹈都是象徵1950-60年代韓國的美國特色。⁴⁵⁾在這樣一個把經濟放在首要地位的現代化進程中，再加上美國文化的影響，「金錢」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美國」成為人們夢想的理想之邦。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中，在聽到鍾辰堅信「知識」可以拯救貧困韓華命運的話之後，好友宋強則看破紅塵一般辯論道：「要往後打算就先得有錢。你沒有錢，你在這個環

42) 高嘉謙，〈武俠：近代中國的精神史側面〉，《中極學刊》，第1輯，2001.12，p.189，p.195。

43) 林保淳，〈成人的童話世界——武俠小說的「本體論」〉，《政大中文學報》，第9期，2008.06，p.199。

44) Hyun Ok Park 著，陳春燕譯，〈「問題出在資本主義！」：論哈若圖寧的時間〉，《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陽明交通大學，2017，p.24。

45) 임영태, 《대한민국 50년사》, 들녘출판사, 1998, p.117, p.173.

境就別發表妙論。錢儘管不是你想象的那麼重要，但它也是資本要素之一。」⁴⁶⁾感到不能與時代接軌的鍾辰，盡管大街上肩擦肩的人群在忙碌奔波，盡管市聲囂張，他的心卻被空虛鏤蝕。直到有一天他來到美國公報園圖書館，他感到自己不再有所失落。即使每天正午都會輾轉饑腸，但他似乎也能夠容忍。每天像煞有介事似的，夾著一本破舊的英漢字典，走進圖書館。他並不急欲學什麼英文，只看圖片，因為圖片可以滿足他夢幻裏的一切，跳動在紙面上，令他陶醉，令他流連忘返。⁴⁷⁾

激情已被現實鏤空的鍾辰，為自己搭建了一座空中樓閣，在那裏暫且收拾殘破的心情。那座空中樓閣似乎也是小說作者為自己所建。但全知全能的作者很清楚，空中樓閣必將幻滅，這裏的美國公報園圖書館也並非美國。以鍾辰的經濟條件根本無法再遷美國，就像很多現實中的韓華一樣。正因如此，我們不得不去關注作者在小說中設置的另外兩個人物——趙萍萍和她表哥。從人物特徵上看，鍾辰以及他的好友是講義氣、重情義的「正面人物」，而趙萍萍和表哥是唯利是圖的「反面形象」。但是鍾辰及其好友始終在艱難痛苦的生活中掙紮，而趙萍萍和表哥卻過得非常瀟灑。這裏對「善」與「惡」的詮釋，並不像武俠小說〈煙臺風雲〉那樣單純，而是被作者重新解構，在解構得過程中，獲得對身份認同的重新思考。趙萍萍和表哥同樣是韓華青年，但是他們與小說中登場的其他韓華青年不同的是：趙萍萍從小讀韓國學校，表哥與韓國人的關係非常親密。作者雖然尚不確定，但他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模糊地感受到韓華如果想望真正的烏托邦，需要具有打破像「民族」、「血緣」這樣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的勇氣，正視移居地在地化實踐的必要性。

誠如哈洛圖寧提醒我們的，假使觀看的視角是由歷史與歷史性事物決定，日常性便退場成了朦朧不清的剪影，輪廓難以辨認；但假使觀點偏好的是日常性、經驗與記憶，歷史性事物則變得模糊。我們面對的是兩種認知模式、兩種時間性。兩者必須不斷被串連在一起：一邊，是歷史冀望還原過去的企圖，是被排列成規則線性順序的歷史發展；另一邊，則是記憶對時間所做的不斷折返。我們必須將兩者結合起來。⁴⁸⁾因此，如果〈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和〈煙臺風雲〉都展現了韓國華人的冷戰現代特殊性之外，〈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日常性帶領我們認知冷戰現代性的不均衡現象，而〈煙臺風雲〉的武俠小說形式則串連起失落的時間與歷史，並在冷戰現代性中激發出記憶折返的（不）可能。

46) 張嵐，〈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韓華春秋》，第3期，1964.08，p. 30。

47) 參考張嵐，〈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韓華春秋》，第4期，1964.09，p. 29。

48) 哈若圖寧著，陳春燕譯，〈「我們的現代性」/我們的歷史〉，《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陽明交通大學，2017，p. 17。

【參考文獻】

<단행본>

- 임영태, 《대한민국 50년사》, 들녘출판사, 1998.
- 정인섭, 〈화교에 대한 차별: 그들은 한국사회의 주민인가?〉, 《사회적 차별과 법의 지배》, 博英社, 2004.
- 彼得 布魯克(Peter Brooker)著, 王志弘、李根芳譯, 《文化理論詞彙》, 巨流圖書, 2003.
- 哈若圖寧 著, 《歷史的記憶與日常: 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 陽明交通大學, 2017.
- 梁 楠, 《韓國華人華文文學論》, 秀威出版社, 2020.
- 羅立群, 《中國武俠小說史》, 瀋陽遼寧人民, 1990.
- 馬仲可, 《山東華僑研究》, 新星出版社, 2005.
- 陶東風, 《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份子》, 上海三聯書店, 1999.
- 王德威, 〈傷痕書寫, 國家文學〉, 《一九四九: 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 三聯書店, 2008.
- Harry Harootunian,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John Christopher Hamm,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논문>

- 고혜림, 양난, 〈문화접촉의 경험이 문학작품을 통해 구현하는 작중인물의 심리학적 접근과 고찰〉, 《중국학》, 제63집, 2018.
- 박규택, 〈중층적·역동적 시공간을 통한 한국화교 이해〉, 《한국민족문화》, 제63집, 2017.
- 鄭樹森, 〈大眾文學·敘事·文類——武俠小說札記三則〉, 《21世紀》, 1991年4月號總第4期.
- 陳佩甄, 〈現代「性」與帝國「愛」: 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 《臺灣文學學報》, 第23輯, 2013.
- 高嘉謙, 〈武俠: 近代中國的精神史側面〉, 《中極學刊》, 第1輯, 2001.
- 林保淳, 〈成人的童話世界——武俠小說的「本體論」〉, 《政大中文學報》, 第9期, 2008.
- 王恩美, 〈《中韓友好條約》簽訂過程中的「韓國華僑問題」(1952-196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二十三卷第二期,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1.
- 翁智琦, 〈冷戰時期臺港文學在泰華的傳播與影響: 以《世界日報》為線索〉, 2017年台灣文學學會第一屆年會會議論文.

<기타자료>

- 長峰, 〈煙臺風雲〉, 《韓華春秋》, 第15期-第19期, 1965.
- 禹湯, 〈都是魷魚惹的禍〉, 《韓華春秋》, 第8期, 1965.
- 張嵐,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韓華春秋》, 第1期-第6期, 1964-1965.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냉전 현대성, 한국화인, 한국화인화문 소설, 상품문화, 중국상상				
	영문	Cold War modernity, Korean Chinese, Korean Chinese novels, Commodity culture, Chinese imagination				
<p>Cold War Modernity : A study of Korean Chinese Novels in the 1960s</p> <p style="text-align: right;">Liang, Nan · Weng, Chih-Chi</p> <p>This paper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ity of the Cold War, examining and analyzing two works of Korean Chinese novels in the 1960s, "<i>A different kind of feeling in my mind</i>"(bie you yi fan zi wei zai xin tou) and "<i>Yantai Story</i>"(yan tai feng yun). Both of these two works show how Hanwha looked for self-coordinates in the changing times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What is the modernity' is the dialectical issue in these novels. How do they reflect the issue from the social reality, transnational movement, utopian imagination?</p> <p>When modernity brings about changes in regional movement, cultural convergence,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how do they imprint on the Korean Chinese?</p> <p>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that was born in response to the Cold War was not only a means for the regime to recruit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form of education subsidies,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move across borders, engage in new trade patterns, and produce unique commodity culture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war broke ou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regimes became a fact. Korean Chinese learned the way of imagining China in popular novels and created an ideal utopia by this. Although it exists in the past time and space, it also embodies the helplessness of reality.</p>						
저 자	제1저자	양 난 / 梁 楠 / Liang, Nan				
	교신저자	웡즈치 / 翁智琦 / Weng, Chih-Chi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1.05.19.	심 사 일	2021.05.30.	게재확정일	2021.06.16.